

近代组织传媒与晚清公共舆论的扩张

——以学堂生群体和功能性社团为中心

刘增合

内容提要 清末兴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功能性社团等信息传导的中介组织，作为公共舆论的最基本单位，实际上是一个个趋新性的舆论圈，由其内部向外围世界传承域内信息，增强界内人士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度，由此形成晚清公共领域重要的内驱力因素，成为清末公共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激活性因素，对近代市民意识形态由省垣市镇到乡村的辐射和蔓延发挥了组织传播媒介的作用。本文从考察晚清时期的组织传播媒介入手，对这一时期公共舆论与媒介形态的正相关形态进行了分析。

公共舆论的孕育与发展是中国晚清时期社会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它主要是指一个公民团体正式或非正式地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机构进行批评和监督，这也是晚清国家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共舆论的形成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它必须以一种拥有理性能力的媒介群体的崛起作为先决条件。晚清媒介的总体形态基本上呈现出层次较多而又相互粘连的特征，大众媒介与组织媒介交相网织的格局已渐次形成。关于大众媒介的论题学术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晚清时期的组织传播媒介切入，以观照这一时期公共舆论与媒介形态的正相关形态。

一、传播媒介：一种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分析工具

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决非偶然——没有传播，社区无从产生。传播行为的实现却要依赖于媒介（Media）的运作，因而可以说“媒介”网络着社会，营构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从传播角度探讨了“社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意共前领导人葛兰西专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了市民社会的构成，他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各种私人或民间机构的总称，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以及政党等，在葛氏视野中，市民社会即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是统治阶级实现“文化领导权”和革命阶级建立对立的权力系统的主要领域。^[1]20世纪中后期，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J·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1962年）等著作中，探讨了欧洲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出版社、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发表公众意见场所的历史。他认为，随着资本经济因素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个人解放，由这些公众意见“场所”（即“对话场所”）所构成的公共空间日益扩展，它既是瓦解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性因素，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雏形。哈贝马斯断言，他最初关于欧洲“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出现的论点，主要来源于新文学流派的发现，例如《观众》（The Spectator）等符合大众口味的小说和杂志，以及新的商业报刊所体现的“新闻和信息的商品化”。他所定义的

“公共领域”有两个特征，它既是公共舆论表达的场所，而且这种表达又不受高压政策的强制。70年代以来，有些研究欧洲（特别是法国）早期历史的学者，如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恰特尔（Roger Chartier），相当细致地考察了文学和不断发展的出版业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重塑公众舆论的情况，发现它们已远远超出了“政治出版物就等于政治化了的公众舆论”的简单公式。^[4]这一点在兰金对中国的研究中也初步揭示出共基本的倾向，他认为，只是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随着商业性报刊的出现，“公论”、“公议”、“民心”、“舆论”等才开始超出直接的地方利益争端，也才被看做抽象理智的具体化。因而可以说由传播媒介角度来探讨社会形态发育程度的尝试由来已久，但是将其运用于东方民间社会形态的研究则是刚刚起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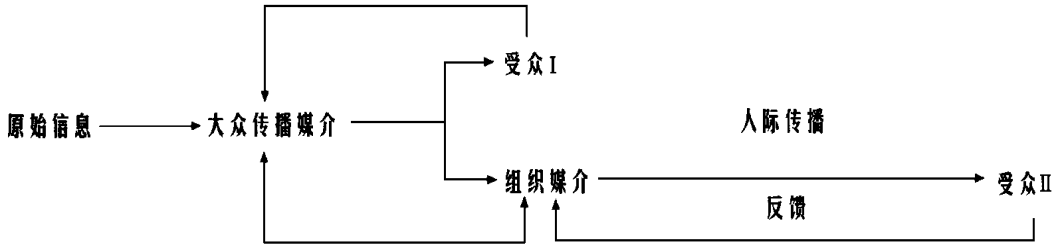
从麦克卢汉那一引起争议的“媒介就是信息”到丹尼尔·杰·切特罗姆的“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映和文化内容的渊源”，^[3]这些观点尽管有的论者不以为然，认为它浸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但上述观点至少申明了媒介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据此来考证爬梳晚清媒介结构和发展形态及其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舆论问题便不是多余的。

根据丹尼斯·麦奎尔的看法，“大众传媒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4]麦氏这一界定，仅仅着眼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未涉及媒介的历史概貌，因而是个不完整的。就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最起码经历了口语、书面、印刷和电子传感四个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即主张：必须把大众媒介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能够表达意思的鼓声、烽火以至于宣讲人和集市都归于媒介一类，因为它们都扩大了人类进行交流的能力。^[5]这种界定已经关涉到媒介的广义层次，笔者准备在这一层面上解释晚清媒介的形态、结构和功能。

二、组织传播媒介、晚清公共舆论扩张的重要酵母

本文关注的组织媒介主要是指清末兴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功能性社团等信息传导的中介组织。从清季末年公共领域的生成机制上看，它们又基本上相当于哈贝马斯关注的“咖啡馆、沙龙、党派”等舆论媒介，作为公共舆论的最基本单位，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个趋新性的舆论圈，由其内部向外围世界传承域内信息，增强界内人士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度，由此形成晚清公共领域重要的内驱力因素。按照威尔伯·施拉姆对媒介类型和含义的论述，从晚清公共空间实际生成和扩展的范围来看，近代社会次第登台的学堂生群体和各种功能性社团等社会有机组织，曾以辅助媒介形态填补了大众媒介的某些不足，事实上也成为清末公共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激活性因素，对近代市民意识形态由省垣市镇到乡村的辐射和蔓延发挥了传承中介的作用，有学者喻之为“天然媒介”或“辅助传播网”，^[6]笔者干脆视之为组织传播媒介，以对应于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学界曾经提出过一种“两级传播论”或“N级传播论”假说，注重传播效果和过程中的中介因素（Mediating factors）的存在价值。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论假说以及克拉珀的中介因素理论，晚清社会的实际传播程式应该是这样的：



此程式在清末的运作，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大众传媒面对的是两种类型的受众：“受众I”表明那些已经接触书刊报章等传媒而且有感知其中的信息含义，并有能力作出自己反应的人们，这一群体大约是近代社会中的士、绅等受过较多教育的社会主体；“受众II”则是一个庞大的无缘接触媒介或缺乏接受信息内容并作出反应能力的人们，这大约是指下等社会阶层或边远地区的人群。相比之下，后者的人口、地域和范围要远远的大于前者，因而探讨晚清公共领域的发展程度或规模时必须关注这一事实前提。研究大众媒介的结构形态时人们曾经注意到，它主要是以文字印刷形式传输辐射的，这种形态要求有相应的文化受众群体的大量提供，但是清末社会民众的低程度文化水平现状显然是不能够胜任的，^[7]况且传播技术和网络的低程度现状，日益显示出“舆论中介机构”的极端重要性。晚清渐次崛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各种功能性社团正处于大众媒介的边缘，并且多以组织形态来运作，因之称其为组织传播媒介实不为过。

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晚清政权将其视为新政的重要举措，并寄予厚望，“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8]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却背离了清末统治者的初衷，两种从内容到形式根本对立的教育制度，适逢晚清的重大变局，效应与结果实难契合。本文关注晚清学堂生群体的视点有二：其一、学堂在1904—1909年间得到长足发展，学堂生的规模也就急剧膨胀，由1905年之前的258873人跃升至1909年的1638884人（不含军事、教会的学堂生），^[9]总计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总数在300万人左右。这一群体是构成近代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作为公共领域中的能量较大的群类，对同处于该空间中的商人阶层、绅士群体等都具有牵引、制约的互动效应，由此规约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走向，故此不应忽略对它的研究；其二，就本文关注的晚清媒介形态的视点而言，这一阶层又加强了大众传媒的辐射影响，作为组织媒介它直接地扩展着公共舆论空间，承当起哈贝马斯关注的“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对话场所”的角色。依据清政府的规划，专门学堂一般集中于通都大邑，府、县及乡镇依次为中学、高小、初小及蒙学，这样便形成一种阶梯式的学堂布局形态，它在信息传导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于上下互动、双向传感机制的确立，进而演成“学堂——家庭——社会”信息传输的逻辑链条。

甲午战后，“学者不在斗室蓬庐，而在梯山航海”，“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血泪，拼吾头颅，以唤醒国民”成为多数学生的主流意识。^[10]各地学生在感知大众传媒的信息后，“无不广演其说”，^[11]上海、安庆、保定、杭州、武昌、南京、长沙、南昌等地的学堂生群体以演说会为主要传播形式，致力于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宣传。上海补余学堂的文学会“专以开通下等社会，激发他的爱国心，使他晓得国耻国仇，力图恢复”作为宗旨，^[12]并制作了《明耻图》，极受下层群众的欢迎，一月之内便销出数千张。许多学生在假期中，也通过“演说会”的方式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爱国学社、南京水师学堂、

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堂的学生群体联袂演讲，“入座听讲者，上自士林，下至贩夫走卒，每日有五、六、七百人，座为之不容”。^[13] 固定场所演讲与巡回演说相结合，颇受民众的欢迎，“演说到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14] 除此而外，学堂生模仿大众传播媒体形式，积极编辑新式书报，广为发行，以求新知识的广泛播撒。晚清众多的大众传媒也以趋新学堂为发行代办点，例如《中国白话报》发刊后，湖南学生集资订购数百份，“以分送其乡人”；^[15] 成都学生“创设学会，撰报译书著论，通行于四乡，推及于全省”。^[16] 风气闭塞的集镇乡村，有子弟在城市读书的家庭往往成为当地新知识、新舆论的扩散中心，由这样无数个星罗棋布的信息承转点联结成晚清公共舆论传导的基层网络，打破了千百年来田园生活的宁静，使人们越来越强地感受到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无怪乎当时开明之士慨然赞叹：“今吾国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布文明于其乡土为己任，故亦渐觉骀骀日上，城野改观。而其进步之速者，则已见教学之校相望于郊畿，阅报之人遍于妇孺，有藏书之楼，有俱乐部，有体操之场，有演说之坛，有议政之会”，^[17] 这的确是反映了清季末年公共空间舆论传导和信息交汇的客观形态。

功能性社团是时下知识界对晚清文化领域渐次创设的各种“学会”、“会”、“社”、“公会”、“学社”和“会馆”等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职能组织的一种涵括性称谓。功能性社团产生的动因似乎可以从晚清文化领域的觉醒、合群意识的增强等层面来理解，他们藉此扩展群体意识，强化界内活动能量，凸显挣脱封建皇权的公共意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出民间社会与清末政权开始疏离的总体倾向，作为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似乎更应该受到有意识的重视。本文着重从媒介学意义上来检视其特有的舆论信息的传导和中介功能。

作为清末公共领域中的激活因素，功能社团初始于戊戌时期的政治性学会，此后逐渐扩展领域，越来越显示出职能化、功能化特征，并且大多带有疏离、抗争和批判朝政的倾向，正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一定是政府的革命派劲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18] 根据前人研究，戊戌时期是功能社团竞起的高峰，时间也相对集中，仅 1897、1898 年两年计有近 60 个社团组织产生，^[19] 其间横跨了政治、经济、算学、地理、农业、戒烟、女学、格致等十几个类。据张玉法先生统计归纳，此期间社团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达 23 个，占总体的 38%；介于学术与文化之间者计 7 个，占 10%；介于学术与教育之间者为 11 个，占 16%；介于学术与农业之间者 4 个，约占 6%；纯粹以研究新学为目的者计 13 个，占 19%；牲的不详者共 8 个。^[20] 戊戌政变后，这些组织大多陷入停顿。20 世纪初，受晚清新政的影响，趋新性社团再度崛起，类型和规模也较戊戌时期为多，并且相对成熟。^[21]

近代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性较大，求学、致仕、经商、办学等活动更加剧了沿海、沿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信息流动。各种功能社团背靠城市，辐射四方，既介入公共事业的创办，又以倡导新观念、新生活为己任，许多社团兼办报刊或阅书看报机构，试图以各种方式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绍兴教育会的创办即充分考虑到作为媒介因素对外界的影响力度，从而将创设地点作了调整，“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以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22] 然而考虑到“力之不厚”和“非所以振动全郡”，故而“众议速设绍府教育会于沪上”，这也正是基于“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以媒介之尤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入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地各省为开通者也”。^[23] 就媒介传播的效应而言，上海这样的“风气较各省

为先”而且处于“交通毂辐”的位置，自然使较多的趋新社团创设于此。据统计，戊戌时期的功能社团约计24%设于上海，^[24]1901—1904年间的新知识界社团也达到42个之多。

传播媒介的文化意义在于：人类可以将某一时空下的文化信息、舆论形态变为一个群体、乃至全人类共享的财富，人类社会形态的递嬗与传播媒介形态的结构性演变呈正向相关，不可揆离。晚清时代崛起的功能社团堪称张扬趋新舆论、价值观念和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社会载体，它们急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我，牵引域外视听，改变市民的既成观念形态，这也正体现出媒介“告知、劝服和信息共享”的内在特征。作为清末公共空间的粘合剂，近代知识界社团的媒介性功能既反映在其创设宗旨方面，也渗透在它的各种活动中。戊戌时期兀然而现的近代社团倍受人们关注，兹以此为例，粗略观照其“传播媒介——公共意识”的舆论中介倾向。^[25]

名称	创设时间	宗旨或思想倾向
新学会	1895年 或更早	“振兴教学”，“切磋人才”，“讲求天算、政法、兵学、医学、格物各种学术，总其名曰新学”，1897年创《新学报》
明通学会	1896	“考求当世之务”，“联络英俊，广集思益”
群萌学会	1897	以辅仁益智为宗旨，广为藏书，供会友阅览，期望“群学可由此而萌”
积益学会	1897	讲求有用之学，以现设经济科6门为主。集同志相互砥砺，故名积益。以讲学为入手之方
知耻学会	1897	知耻“莫如为学”，主张“购集图书，私相讲习”，“通耻以倡于天下”
质学会	1897	“斯会大旨，意在劝学，务崇质实”，倡导“中体西用”
化学公会	1897	“欲自图强，在兴格致；欲兴格致，先兴化学”
译书公会	1897	“本公会志在开民智，广见闻，故以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辅以同人论说”
蒙学公会	1897	“务欲童幼男女，均治教化为主”，“公议先以书报为起点，而以学会为归宿”
苏学会	1897	“多购书籍以增智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不开标榜之门，力屏门户之见，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邻采西益中之通论”
医学善会	1897年 筹组	“开医会以通海内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
致用学会	1898	以延算学师教授本会同仁子弟为主旨，并广购中外有益之报，供同志阅览。除教学外，以每月初一为集会之日
任学会	1898	立志在宏毅，以能力任艰巨为主，以练习学问、物色英才为入手之方。讲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拟办报章、立学堂、派游历、设书室、刻印时务书籍。每年大会一次，两月小会一次
学战会	1898	以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为主，取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之义
公法学会	1898	专讲公法之学，凡各国互立新旧约章，须切实讲求，会中置中外书报，并讲学，每旬聚会两次，互相讨论
白话学会	1898	提倡白话文，认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办《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设白话书局
废时文会	1898	以废除时文，改革科举为宗旨
奋志学社	1898	讲求吏治，研讨时务
工商学会	1898	创《工商学报》
蚕学会	1898	以考求养蚕新法，推广于民间为宗旨
镇江学会	1898	“鸠集同志，以朋友讲习……群多士之智识，以互易聪明”
皖学会	1898	“崇圣教，联乡谊，讲经济，开风气”

相比而言，20世纪初期的功能社团较之戊戌时期的社群团体，在组织建制和理念追求上更趋向西方近代民主的形式和内涵。就媒介的影响力来说，无论在鼓化文明、启牖民智方面，还是在扩张群体意识公共精神方面，前者要大于后者，这一点从社团组织创设布局的比较密度上可资证明。戊戌时期的学会、学社大都创于省垣通衢之处，而20世纪初则由大城市嬗递到中上城镇，城乡之间的信息流动更趋增强。尤其是江南发达地区更是走在其他省份的前列。常熟到1903年先后设立过开智会、音乐会、体操会、师范讲习会、教育会支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等；^[26]松江地区则创有幼童会、书报会各两处，体操会三处，化学研究会、音乐讲习会、师范讲习会等；^[27]温州瑞安则创体育会六、七处，以及演说会、学生会等；^[28]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演说会、阅报会和女学会等。^[29]一定地域内相对集中地布

设了多种功能团体，既反映了它们作为创新媒介活动能量增强的趋势，又有力地证明了近代公共空间地域性的扩张北流。

晚清社团组织，通常是与大众媒介、学堂生群体相互交织、互为倚重，它们在公共舆论和价值观念的扩张功能上呈现出各具千秋，彼此补偿的态势。本文区分大众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仅仅是遵从传播学的理论要求，并且也关涉到清末公共领域游离过程中的诸多制约因素。媒介形态的剖析，笔者认为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参照角度和分析范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视点，更客观全面地概括和修正关于晚清封建政权与公共舆论的互动关系形态。

三、组织传播媒介视野中的社会与国家

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的倾向，认为社会与“邦国”的分离是近代市民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分离过程是复杂的，涉及了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以至于文化等多个领域。占主流的学术观点胡已考证并认定这一事实，但这种考证与认定几乎没有越出对经济和社会分支系统内的历史关怀，诸如会馆、商会、公所、义仓、善堂以及地方绅士的自治活动之类，而且据此提出了政治国家与近代民间社会之间所保持的良性互动关系说，可以断言，在经济——社会系统内，这种观点大概不会有错。近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其中的公共精神体系、公共舆论状态这类文化系统展示着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品格和意识形态基础，它的运作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政治国家互动关系的性质也有别于商会、义仓之类的经济——社会系统，由组织传播媒介角度来观视这一现象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严格说来，支持依附于封建政治国家的精神系统、文化系统是任何封建朝廷（也包括晚清政权）固守、经营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之可以理解，扼杀“异端”思想、文化以及潜在的“腐蚀性”舆论是历代封建王朝始终如一、不容更化的政治观念。清代的文字狱、洋务运动中的“中学为体”，都表明了这种固守封建文化系统的强韧和坚定。士人结社植党曾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朋党干政”、“异端之源”，坚决禁绝。清顺治朝的礼部曾制定学宫条款，严禁诸生“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顺治十七年更有严禁结社的上谕：“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30]时至20世纪初年，仍强调新政学堂的立学宗旨为“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目的在于“造就通才”和“慎防流弊”，念念不忘儒学“圭臬”，藉此“以化未俗浇漓之习”，否则，单纯学习西学，“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31]如此，“士”作为封建文化载体的角色已被牢牢锁定。相比之下，受“商战”思潮促动，也迫于时局困顿，新政初期作为商人自治团体的“商会”首先获得合法地位，并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持与保护，而对士人结社仍予禁止。相对于绅商自治、商会、义仓之类，组织传播媒介所体现的文化系统游离于封建政治止。相对于绅商自治、商会、义仓之类，组织传播媒介所体现的文化系统游离于封建政治——文化樊笼的艰难性自然要大得多，游离过程中的政治疏离和批判精神理所当然地多于对封建政权及其道统体系的依赖和支持。

这里的疑点在于为何同处在公共领域之内，经济——社会系统（诸如商会之类）与封建国家政权基本上呈现良性互动关系，而文化系统则正好相反？有学者提出过一种极有价值的分析方法，认为研究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关注两个方面，既要从国家的面向看，也要从社会的面向看，由此梳解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32]的确，这种分析方法是能够合理地排比处理关键的材料，以解释上述疑点。与商会等组织相比，文化类型的组织媒介参与

创构的文化系统，其孕育、发展过程中远没有前者曾获得过的政府支持和奖掖的荣耀。如果说封建政权也对近代媒介产生过积极影响的话，那仅仅是清末新政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及无可奈何的失控状态，封建国家并未让渡其最后的阵地。清末有限的公共舆论空间是媒介力量“趁清政府的社会控制相对松动之机，顽强地自我生长，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33]

尤其不应忽视的是商会一类经济社会系统与媒介文化系统尽管同构于公共领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桑兵先生在有关课题的研究中也曾关注这一现象，并作过精彩的对比。在此有必要加以引证说明。首先，“由以士为主的开明士绅和学生组成的社团”侧重于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以输入文明、培育国民为主要目标，大都从事宣教活动，很少介入权力竞争；而“得到官方承认或鼓励，以绅商或绅为主体的社团”则侧重于实际利益与权力的争夺控制，试图通过结社达到分享权力的目的，不仅继续保持对基层社会权力的垄断，而且借兴民机之名扩展绅权，参与地方乃至中央政权；其次，前者努力成为全体国民的代表，较少群体私见，反对皇权官权，争取民权，对上要求民主，对下代表民意，社团内部也实行民主制；后者则首先表达和维护本群体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其目标，对上主分权，对下主集权，担心实行普遍民权反而会威胁其既得利益，其权力来源更多地决定于地位、声望、财富及社交因素，并非组织成员意见的向背；再次，前者明显具有反抗官府离异朝廷的意向，后者则与官府朝廷有着既互相依存又明争暗斗的关系。“两类社团的差异，表明近代中国的士与绅，或投靠文教事业的士绅与从事其他利权事业的士绅（或绅商）在发展趋向上有不同。”^[34]两个系统的政治疏离程度、发展趋向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制约着它们与政治国家之间各自不同的互动关系状态。“良性互动关系”学说仅仅是反映了以近代商会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情况，它实在不足以涵括晚清时期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基本概貌。率先对中国晚清时期公共领域问题展开研究的美国学者 M. 兰金 (Mary B. Rankin) 也主张：公共领域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35]地域性、行业性以及政治环境的差别，都足以使公共领域的“公共舆论性格”杂彩纷呈，晚清市民社会尽管处于“雏形”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系统的结构；公共领域尽管是“公共的”，也决不可以简单化约。

作者：山东烟台师范学院政法系 讲师

注释

- [1]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另参阅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对其理论观点的分析。
- [2] N. Z. 戴维斯：《近代法国早期的社会与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189~227页；R. 恰特林：《写作的实际影响》，见菲利普·阿里耶斯和乔治·杜比编：《私人生活史》第3卷《文艺复兴时期的情感》，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11~159页；R. 恰特林：《法国革命的文化动因》，达拉谟，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3] 分别见于麦克卢汉与昆廷·菲奥于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它反映出麦氏对媒介重要作用的看法和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199页。
- [4] 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7页。
- [5]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121页。
- [6]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13、400页。
- [7] 20世纪30年代，巴克曾对中国22个省的308个县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只具备读懂一封简单家信的文化程度；晚清时期的景况不会比这个水平更理想。《万国公报》

曾撰文指出：“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古黔孙鉴清：《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万国公报》第183册，1904年4月。

- [8] 《光绪政要》，崇义堂刊（1909年）第27册，57～59页。
- [9] 《学部之教育统计》，《民立报》1911年2月28日。
- [10] 《曹君梁厦致同里李某书（序第十号）》，《童子世界》上海1903年4月20日，总第15号。
- [11] 绿意轩稿：《民权问答编》，《东浙杂志》（金华，甲辰十二月），第4期。
- [12] 《文明紹介·各种结会》，《中国白话报》，上海1904年3月，第8期。
- [13] 《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苏报》1903年5月30日。
- [14] 《纪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
- [15] 《〈中国白话报〉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4月8日。
- [16] 李德夫人自成都来函：《成都天足会近状》，《万国公报》第186册，1904年7月。
- [17] 《福建之现势》，见黄藻编：《黄帝魂》，台北，1968年影印本，201页。
- [18]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391页。
- [19] 据闵杰：《戊戌学会考》所列资料统计，《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 [20]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179～184、210～212、216页。
- [21] 据桑兵先生统计，1901—1904年间，国内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其中教育会21个，不缠足会34个，演说会25个，体育会17个，学生会26个，爱国团体17个，科学研究会18个，文学、戏曲、写真等艺术团体16个，妇女团体16个，实业团体17个，卫生及风俗改良组织8个，师范研究会5个，宗教性团体1个，其余为混合型。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274～276页。
- [22] 杜士珍：《论沪上建设绍兴教育会事》，《新世界学报》11期，1903年2月27日。
- [23] 《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年3月12日。
- [24] 据闵杰前揭书资料计算。
- [25] 据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208页；闵杰：《戊戌学会考》；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199～206页等资料择编而成。
- [26] 《常昭调查一斑》，《江苏》第11、12期合刊，1904年5月15日。
- [27] 《学界汇闻》，《警钟日报》1904年8月14日。
- [28] 《国民日报》1903年9月24、27日。
- [29] 《记女学会》，《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8月11日。
- [30]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251～253页。
- [31] 《奏定学堂章程》，2～6页。《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2编 1～4页。
- [32] 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 [33]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289～290页。
- [34] 同 [33]。
- [35] Mary B. Rankin, “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Etudes Chinoises* 1990, 9, P. 54. 西方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罗尔斯在发展其“新自由主义”理论时曾提出一个“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观点，对我们的分析视野极富启发意义。他认为，共同处于一个社会的人，由于具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对于人生价值和政治标准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同时，对于建立公共社会秩序而言，也不必要求人们观点一律，但必须要求有一种公共理性的基础。

keeper and audience who follow fashion are facing a new media world. Old gate keeper has to find job as Web consultant, and it will be a complete new for them, it is a "heads-up displays".

60 *A Produc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and of Journalism Principle in U.S.A.*

Zhan Jiang

67 *Property, Habeas Corpus and Legalization of Freedom of Press*

Zhi Tingrong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legalization process that American freedom of press became personal right and its precondition — separate property, as well as the precondition's initiating, background and changing.

74 *Protestantism Reform and Its Influence on Freedom of Press*

Shao Zhize

Freedom of press concept came out being after a hundred years of the Protestantism reform, the base of the concept was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belief. The affirmation to belief freedom provided protestants a right to reading and explaining the Bible.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refore became a part of basic teaching and unconquerable. The increasing of capitalism elements in the society transformed the results of protestantism reform to be capitalism's organs. That is the freedom of science, academic freedom, political freedom and freedom of press.

81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Organization and Diffusion of Public Opinion During Later Qing Dynasty*

Liu Zengh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some agency emerged, such as groups of

school students and functionary leagues. These agencies were in fact opinion circles, diffusing new mind out of the circles. They were a active factor of public opin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played as a media role on diffusion of modern citizen ideology from town to countrysid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se agen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public opinion.

89 *The Factors to be a Successful Journalist Perspective on Winners of Fang Changjiang Award*

Sun Shaojing

The factors which are discussed by author are two groups, one is personal including, responsibility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mission, religious interviewing, refined knowledge, combination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The other factor group is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social, cultural and working circumstances.